

# 陈云打算盘的智慧

◆ 曹伟明

今天是陈云同志 110 周年诞辰纪念日。作者以文缅怀,回忆了陈云同志善打算盘精算账的一些往事,并写下来刊登在《上海滩》2015 年第 6 期上。

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私养猪还节约稻草。因此,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却要亏本。

陈云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陈云还特别强调,中央关于“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肉猪饲养政策,同样适用于母猪的养殖。最后,他的调研成果,形成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报告,扭转了农村养猪的困局。

## 精做乘法 种双季稻得不偿失

青浦的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过去不种双季稻。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有些领导好大喜功,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以此来提高粮食产量,并规定了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当时,青浦农民对种双季稻很有意见,因为“种出来”的后季稻不饱满,西北风往往能把稻秆吹倒。农民形象地说,种“双季稻”要“双脚跳”,“老天爷不帮忙就变成伤心稻”。

陈云通过实地察看,走访,在农民的座谈会上,他精确地算了这样一本账:“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 220 斤上下,但实际上看,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都很大,各项损失总和约 300 余斤。”陈云自信地娓娓道来:由于种双季稻要在单季晚稻中寄秧,寄秧田将因此少产稻谷约 150 斤;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用稻种 40 斤;加上种双季稻不能种夏熟作物,如蚕豆、小麦,又损失了 60 至 80 斤。此外,种双季稻多用肥料,多用劳动力等,成本支出较高,又折算掉几十斤的稻谷。陈云根据小蒸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出“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种蚕豆效益好”的结论。

1960 年,小蒸周边的嘉兴地区的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到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但却减

了产。对这个新的耕作制度,广大农民都不适应,农业科学家也有不同看法。最后,陈云形象地说:“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种双季稻是得不偿失,应该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做好乘法,才能让农业的效益最大化。

## 敢做除法 才能消除小偷小摸

陈云在青浦农村对小蒸进行调查时,农民反映强烈的是:当时青浦农民生活困难,小偷小摸多,集体利益受损的现象普遍。陈云走访了群众,查阅了相关资料,对小蒸公社农民自留地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召开了自留地问题的座谈会。会上,广大农民反映自留地太少,而且多为“杂边地”,即路边、河边、塘边等大田之外的零散土地,满足不了农民吃菜充饥的需求。陈云反复权衡以后,赞成大家的意见,主张农民增加自留地。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吃饱肚子、渡过难关,还可以消除农民小偷小摸的问题。

陈云说:“土地少的地方,自留地的比例要高于 5% 至 7%,甚至 7% 到 8%。高产地区如果还继续这样搞,农民肚子很饿,要保持高产,就没有办法。你不给自留地,他就偷。今年 6000 亩红花草,农民成群结队吃掉 4200 亩,结果晚稻肥料很少。不仅新鲜吃,而且晒干。青蚕豆,也是吃了再说。攒麦子的时候,不攒干净,麦秆上留了很多,回去自己搓下来吃。”陈云还形象地比喻说:“你不让他走新街口,他就走小巷;不让走天安门大街,就走了弦胡同。结果,公私两不利。”

针对群众说的“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的顺口溜,陈云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股浮夸风,必须制止。他觉得要勇做除法:只有留足自留地,才能彻底消除某些农民的偷窃行为。只有安排好群众

的生活,才能使我们党与群众血肉相连。

## 巧做减法 取消不合理的来回折腾

青浦是个“开门见河、出门动橹”的江南鱼米之乡,全境有 21 个湖泊,水产资源非常丰富。以往许多农民和渔民于晚间在黄浦江周边捕鱼,待到黎明时到上海出售,作为家庭的副业收入。后来,上海市有关部门规定,青浦每月要向市区供应若干吨鲜鱼等水产。青浦鱼就不准农民和渔民把捕到的鱼,直接运到上海市区出售,而是要先运回青浦,卖给青浦的水产公司,集中后再运往上海市区销售,完成青浦的水产供应指标。然而,这样绕个大圈子,来回折腾,两次运输,不仅把原本鲜活乱跳的活鱼运成了死鱼,而且提高了运输费、手续费等成本,导致农民卖不出好价钱,市民吃不上新鲜鱼。陈云调研后,觉得这种做法不合情理。于是,他找青浦县委领导谈话,要他们做好减法,取消这种不合理的流通环节,保障鲜鱼的供应。

1978 年秋,陈云在杭州休养。一天黄昏,他到玉泉公园散步,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算盘声。原来,公园茶座的一位女会计正在“噼啪啪”打算盘结账。陈云不觉眼睛一亮,他走过去,十分谦和地对那位女会计说:“你的算盘让我打一下可以吗?”女会计看见是一位彬彬有礼的长者,就说:“可以,请打吧。”陈云坐下来,十分熟练地打起算盘。那位女会计看到此景,很佩服地夸奖道:“老同志,你的算盘打得好!是老会计吧?”陈云用上海话连声说:“谢谢依!谢谢依!”

陈云打算盘这个镜头,被跟随陈云一起到公园散步的工作人员拍摄下来。1981 年 1 月,赵朴初先生看到陈云打算盘的照片,欣赏之余,赋诗一首,刊登在《财政杂志》第 3 期上。诗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不仅赞颂了陈云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夸奖了他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中善打算盘,为民谋利,还巧妙地陈云一贯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实事求是精神进行了形象化的概括。

#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 10. 我叫何叔衡

1921 年 6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月末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怀着崇高的希望,迈着坚毅的步伐,登上了停泊在湖南长沙码头的一艘轮船,从长沙动身,途经武汉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先后回到湖南,着手建立湖南的党组织。同年 10 月,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毛泽东等人在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同时,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随后,自修大学还附设了补习学校,吸收文化程度较低的进步青年入学。

贡院东街新开了一家文化书社,销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晨报小说》等书籍和《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等杂志,有时还有些《北京农报》和《时事新报》。陈赓每到周末,就去书社转转,看有什么新到的书。

他买了一本新出的《向导》,刚付了钱,就听到耳边有人轻轻问:“买两份《通俗报》吧!”

陈赓转过脸一看,说话的人四五十岁,留着八字胡,头发不多,戴着一副圆边眼镜,穿着长衫,猛一看,完全是个秀才模样。陈赓觉得这人眼熟,只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陈赓连忙答话:“我买过几期《通俗报》,可惜都是些政府公告,还有些文章在别处也见过,恐怕是从大报上剪剪贴贴,抄抄摘摘来的,我不买了。”

那人含笑地点头,说:“看来你很有见解。你说的《通俗报》是老的,现在本报已经改版,你再读的时候会感到新鲜、痛快。”

陈赓接过报纸,看了一下栏目,便发现先生说的果然不假,不但报纸内容变了,连版式也新颖吸引人。他欣喜地付了钱,买下两份。陈赓正要出门,突然想起什么,又回过问:“先生莫不是毛润之?”

润之是毛泽东的字。陈赓记得某报的一篇文章:《发起文化书社缘起》,就是毛润之写的。文章中的几句话他也记得清楚:“……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陈赓很想结识这位毛先生。

可眼前的人却将着一把胡子说:“他没有我这么老,也没有我这一副眼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问题弄不懂,想向他请教。我是铁路上的职员,当过湘兵。火车一趟趟路过湘江,可为什么满江停靠的是‘太阳旗’、‘花旗’、‘米字旗’的兵舰,河岸上修起了‘日清’、‘太古’、‘怡和’的外国公司的洋房?帝国主义在这里行船;封建军阀在这里饮马,滔滔湘江水,何日才能洗尽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什么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这么横行无忌?”

长胡子注意地倾听着,扶了扶眼镜,问了陈赓的姓名和简况后,告诉他:“你可以到小吴门外清水塘去找他。他最近开办了一所自修大学,不少有志青年都在那里听讲。”

“你还忘了请教先生尊姓大名?”“我叫何叔衡。”何叔衡的人,叔侄的叔……”

陈赓眼睛一亮,差点没喊起来:“你就是何先生?我读过你的文章,我拜你为师……”

何叔衡弯下腰,拉住陈赓,诚恳地说:“我恐怕没有那么多精力,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朋友。除了毛泽东,还有郭亮、姜梦周、蔡和森,他们都年轻有为,你应该向他们靠拢……”

自修大学教室是借用小学平房校舍。学生放学,青年们就来上课。学员们想从这里弄清中国的实际问题。陈赓走进那间狭窄的教室,眼光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他细高瘦长,头发浓而蓬松,像戴着一顶黑帽子。他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永远像在搜索什么。他那不算太薄的嘴唇特别富于表情,一张开,便发出抑扬顿挫的语调:“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志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今天到来的学生,最起码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炒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做准备……”

## 5. 开始学英语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电视可真是初级阶段啊,拍出来黑咕隆咚的,还是直播。

当时,我和男朋友认识不久,有人问他:“听说你女朋友在电视台?”“没有,没有!”他总是不愿承认。人家指着电视里的我:“是她吗?”“不是,不是!”“我想也不能啊,咱们哥们儿怎么也不能找那么大岁数的,有 40 了吧?”其实,那时,我才 24 岁。

当时在播音人眼里,广播是最正宗的,电视是新来的。电台看电视台,那眼光,就像国有大厂看乡镇企业。

省电台很好,好好好,可我上学没上够,我还是想上学。走出大学校门时,有些不甘心,这么两年就算大学毕业了?我还可以再上学吗?有人告诉我:“你还可以考研究生。”

回到家乡哈尔滨,我的视野里没有看到一位文科研究生,我手里没有一份相关的资料。怎么考?什么水准?什么范围?一切都无从知道。

怎么办?我只有一个办法,上考场。上考场看看试卷长啥样。于是,我这个没学过外语的工农兵大学生走进了研究生考场。在英语考场,试卷发下来,我作审题状,一行行看下来,字母勉强认识,这字母连起来都什么意思啊?这括号什么意思啊?噢,可能是填空吧?我抬头望望,那些考生都在奋笔疾书,怎么就我不会呢?唉!考场规定半小时之内不能离场,我尴尬地熬着,闲着也是闲着,这一行括号,都填上 A,下一行都填上 B,盯着满目生词,痛下决心:“明天开始学英语!”好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等科目我还能看懂试卷。这一次上考场没指望考上,收获是:我知道差距有多大了,差距最大的是英语。

于是,学英语。最初,我姐教我,她是专业英语翻译,教了几天,忍无可忍地说:“我教过的学生里,我最笨。”后来她教她儿子时好像也这么说。我转身到培训班学去了。最初去南岗区文化馆培训班,后来到电大培训班。面对同学里那些小孩,也挺受刺激的,他们太聪明了,而我真的是够笨的,起点太低,对英语也没有兴趣,感受能力极差,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

让我坚持的,是远方的目标,还有近处的

另一些同学。他们每次走进电大的课堂,都是风尘仆仆的,像是刚下班,手里还拎着空饭盒,勺子在里面当啾作响,网兜里装着白菜、土豆,一看就是拉家带口的。我想,他们一定是老知青,不知经历多少磨难才回到城里,也曾有过大学梦,如今早已过了上大学的年龄,他们疲倦地平静地拿出英语书,与那些隔代的年轻同学一起补习,他们依然有梦。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我至少还没有拉家带口,至少还年轻。我从这些不曾打过招呼的同学身上,获得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

敬一丹

艰难入门后,就到黑龙江大学补习,每周三五学许国璋英语第三册,二四六学第四册,周日学托福。终于在第三次进考场时,英语考了 66 分,最难的门槛过了。但,后话是,敲门砖用完了就扔掉了,英语忘光了,真对不起当年自己下的工夫。

考研,那是一种状态,是全力以赴的投入状态。人的一生,有几个时期能全力以赴?很多时候是漫不经心的,得过且过的。如果能经常保持投入状态,不知会成就多少事!

1983 年,考取研究生的时候,我 28 岁,是“已婚妇女”。我在第一次进考场落败时,遇到同样落败的一男考生,于是有了落败的共同语言,后来他又进考场,先于我考研成功,成为我先生。

回到母校攻读硕士期间,电视蓬勃兴起,主持人方兴未艾,我被吸引了。

1984 年,我把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报给导师齐越教授。我的题目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这个研究方向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我也听到一些劝告:这个题目太新了,有风险,可借鉴的东西太少,齐老师重视传统,会愿意让自己的研究生去做一个陌生的题目吗?

齐老师看了题目,说:“好,研究从广播电视第一线的实践调研开始。”

接着,齐老师写了个条子:“沈力环同志:我的学生敬一丹要研究节目主持人实践,请你帮助她。”齐老师解释,就是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的沈力老师。还有几个条子分别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节目主持人虹云,对台广播主持人徐曼……

# 我遇到你

